

城镇化语境下 解读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乡土之道

魏晏龙

(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与中国农村的发展息息相关。身处城镇化变革氛围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不能回避记录这一伟大时代进程的任务。在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高兴》和《带灯》之中,中庸之道,至善之道,民本之道被刻画的深沉隽永,意味深长,构成了中国特色浓郁的乡土之道。三部作品是贾平凹将创作语境深植于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后所收获的精神成果,体现出了贾平凹在城镇化的创作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执着的文学坚守。

关键词: 贾平凹; 城镇化; 乡土之道; 中庸; 至善; 民本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1-0088-06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城镇化之于中国并非新鲜的概念。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斐然成就。同时,应当承认,城镇昂然发展的态势反衬出的是中国乡村的寂寥与颓默。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城镇化有关。城镇化是重要问题,而农村建设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把重要问题和最艰巨的任务相结合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国梦,意义非凡。

在城镇化的大幕徐徐拉开后,都市文化的主角地位尚未完全确定,乡土文化却已近落寞,这让处在两者之间的文学比较尴尬,同时也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产量颇丰,但却精神羸弱的现状。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之中,字里行间顽强跳动的依然是乡土中国的脉搏。历史的进程和当下的潮流对具有强大乡土叙事传统的中国文学而言既是空前的挑战,

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如何在城镇化语境下保持中国乡土文学的血脉和血性,成了当代中国作家不能回避的义务。既然不能回避,就必须迎难而上,为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寻路。路即道也,寻路即是寻道,寻觅条条铺陈在城镇化高山大泽之后的乡土之道。

《周易》之谓道,在一阴一阳两端若隐若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而在老子眼中,道虽不可道,却在天地自然之间玄之又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孔子让高高在上的道回到人间,称其“不远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而庄子心中的道,则是褪去了神秘外壳而“无所不在”(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知北游》)。在庄子看来,像蚁群、草垛、瓦砾,甚至屎尿这样最为低贱的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因此寻道之途不是往上,而是放低身段,不断

收稿日期: 2015-11-0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3102014RW0029)

作者简介: 魏晏龙(1977-),男,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及应用语言学。E-mail:wyl@nwpu.edu.cn

向下，下到民间，下到乡土，直通地脉。与农村生态渊源深厚的中国乡土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正在于千年后的作家们仍能不悖道源，躬身向下。从鲁迅到沈从文，从孙犁到莫言，都在用自己的文字触摸乡土，敬畏乡土，感悟那游弋其间、玄之又玄却又无所不在的道。就在他们中间，文学陕军渐渐成为一支无法被忽视的力量。作为文学陕军代表人物的贾平凹，其作品中常常深蕴着对中国农民命运和灵魂的持久关注和探索。在其长篇小说中，能够碰触到这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熟稔西方现代文学潮向的当代中国纯文学和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1]对于中国独有的乡土之道的通透刻画与深沉思考。

贾平凹曾说过：“农村丰富得很。中国现在虽然实行城镇化，但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面积大，比重也特别大，农民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别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其实是在关心整个中国的进展”^[2]。本文即以城镇化为依托，进而对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秦腔》、《高兴》和《带灯》中的乡土情结进行梳理和剖析，以期跟随作家的文字脚印，去感受那一条条弥漫着传统文化厚味的乡土之道。

一、《秦腔》——厚土之上孕中庸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3]⁵¹⁷。这是小说《秦腔》后记之中一句铿锵且不失深沉的文字。小说以秦腔为主线，道出了陕南小村清风街上飘荡的秦腔已不再豪迈与洒脱，转而变得无奈与苍凉，最终竟渐渐无法与村民陈星的几首流行歌曲相抗衡而走向颓落。秦腔是乡土精神的升华，秦腔的落魄恰正是由于乡土已然失却了充沛的地气。痴爱秦腔的白雪和公公夏天智，都把秦腔视为灵魂的外化和精神的寄托，秦腔已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然而，这两位小说中的关键角色，前者婚姻不幸，诞下怪胎；后者身患胃癌，郁郁而终，命运都以悲剧收场。他们的不幸更加象征着秦腔的生命力已然疲弱，进而反映出乡村的土地已然失却了令人眷恋的魅力，走向了一种莫名的迟暮。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

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3]⁵¹⁵。在《秦腔》后记中，贾平凹对于土地与农民的感慨既生动写实，又意味深长。以此为背景，小说主人公夏天义被岁月和风霜雕刻的脸庞和身躯也愈加清晰。和夏天智一样，夏天义也是秦腔的忠实拥趸，但是他更象征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捍卫者。在夏天义眼里，土地就是农民的魂，农民的魄，农民因为与土地相生相依，也才有了存在的价值。在任清风街支书期间，不管是遇到“土改”还是“公社化”，“四清”还是“文革”，夏天义始终把为清风街开拓新的土地资源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并为之兢兢业业，收效虽微却乐之不疲。改革开放后，为了维护清风街有限的土地资源，他率众阻止占用耕地的312国道的修建，最终未果，郁闷辞职。面对青年农民离土离乡，向城市进发的同时也撂荒了大片土地，以至于弟弟夏天智身故之后，村中竟已无精壮劳力为其抬棺入土，已然老去的夏天义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面朝黄土，背靠苍天，春种秋收，这才是夏天义眼中一个真正的农民最耀眼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他本人直到离世之前都在身体力行。然而，夏天义已然老迈，取而代之的是以其侄，清风街的现任支书夏君亭为代表的所谓新生代中国的农村干部。夏君亭们关注的不是土地所承载的传统农耕情结，而是土地能带给他们的经济利益。用土地换鱼塘，修建农贸市场和万宝酒楼……夏君亭的种种革新举措在夏天义眼里完全是走向极端，割裂地气。扎根乡土，痴恋乡土的夏天义，执着而倔强地秉持和守护着来自那片土地上的中庸之道。夏天义以一个老农之身，却给了儒者眼中的最高道德以最朴素且自然的诠释，看似不可思议，实则顺理成章。《尚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意为人心崩溃，大道难见，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清风街出现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即是因为脱离了中庸之道，走向了极端。把中庸之道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天命、天道，这就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不无关系。此外，夏天义更明白的是，农耕紧紧地依赖着日月阴晴、四季循环，因此任何走极端的作为都与

天道相逆。夏日炎热到极端则秋风必起,冬天寒冷到极端则春回大地,构成了一个否定极端的循环圈。在夏天义看来,如此循环,便为大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敬畏土地,即“执厥中”。因此,他才与夏君亭在关于土地的争执中,喊出最痛心疾首的声音,“咋不就饿死人呢?!你瞧着吧,当农民的不务弄土地,离饿死不远啦!”^{[3]494}而这位曾经清风街上的领路人已近风烛残年,当年他挺身阻止312国道修建时,村里还有一批老汉老婆忠心相随;如今当他以愚公移山的气魄在那条荒废的七里沟淤地时,他身后看不到同样执着的自己的子孙和村里的青年。子孙们给予他的只是不解和嫌弃,村里的青年则大都去往城市谋生了。他身旁仅有的追随者只有一个哑巴和一个疯子引生,这样的对比实在令人唏嘘。最终被淹没在七里沟的泥石流之中,这便是夏天义的结局。葬身于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黄土之下,这也应是属于夏天义的宿命——土命。土命的夏天义孤独地捍卫着自己恪守的大道,最终却成了殉道者。这样一个挺拔顽强的生命的终结似乎暗示着浓缩了“天人合一”理念的传统中国农耕文明也正和已然为数不多的卫道者一样在走向衰老和死亡。

“……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4]。当土地和土地上所能产出的一切无法再让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产生任何留恋的时候,城市自然便成了他们向往的所在。即便在城市,等待着他们的是鄙夷的冷眼、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苦难,也没有停止他们背井离乡的脚步。他们成为中国城镇化大踏步向前迈进的主要推动力,更是为中国的城镇化奉献了自己的血汗和青春。当城乡二元生态所衍生的种种无奈与悲苦都无法重新唤起这些年轻人对于乡土的眷恋的时候,那一座座城市里的管理者和执政者,那一片片乡土上的管理者和执政者,是必须要去反思和反省的。中国广大农村里的夏天义们正在老去,故去,不能让他们对于乡土的执着和眷恋成为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遗迹和标本,这样的执着和眷恋应当以与时俱进的反思态度、政策力度和技术

强度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唯有如此,才足以告慰那些已经离去或正在老去的夏天义们。他们对于以农为本的坚守,理应在不久的将来,在他们为之眷恋一生的故土上,孕育出茁壮挺拔的希望之禾。

二、《高兴》——归属之间存至善

《高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另类之作。虽然题目喜感十足,但从小说骨子里透出来的是一种雾霾般的灰色。读过之后让人感觉仿佛在某个雾霭漫天的清晨推窗远望,扑面皆是一片灰蒙,从五官到内心都很不舒服,实在高兴不起来。幸然在灰霾深处隐现一汪水影,波光粼粼,让人心头一亮。

从灰色深处走来的青年农民刘高兴和伙伴五富,他们的双脚踏在陌生的西安城的大街小巷,但内心却依旧或多或少驻足在那原本熟悉的乡村。两人身为同乡,年龄相仿,然而对于城市的向往程度却截然不同。在浩荡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军中,刘高兴快马加鞭,他渴望着尽快离开落后的,已经无法承载自己理想的乡土,他觉得城市才是最终的归宿,为此不惜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城市。身体里的一部分已然在城市扎根,初来西安城的他便觉得城里的一切都是美好而亲切的,他已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城里人;五富则不同,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青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所迫和那么一点点从众心理,他对于乡土的眷恋一点儿也不会输给《秦腔》中那个从骨子里都是土黄色的夏天义。农村有五富熟悉的人事,有他日夜牵挂的妻儿。然而乡土已然无法让他为自己的家小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于是他也启程了。他和刘高兴相依相伴,他佩服高兴的见识,对其言听计从,却无法理解高兴对于城市的狂热向往。就这样,这两个像极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年轻中国农民最终还是在城市落了脚。

没来城市之前,刘高兴、五富与夏天义一样,都是土命,来到城市之后,则在颠沛漂泊间成了水命。他们是灰色的水,任由自己的喜怒哀乐随波逐流,无声地流淌在城市中一个个不被关注的角落。他们却不是普通的水,因为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善良的倒影。孟子曾这样形容水和善的关系:“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

下。”（《孟子·告子上》）说明人性本善，就像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一样。关于水善之论，老子的看法当然更为高明，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地位卑下，为众人所厌恶的水，在老子眼里，因为滋润浇灌了万物而不与之争夺，却成了至善的象征。孟子在说善性，老子在说善道，善性普适，善道难觅。而这样的善道，却被刘高兴和五富们在不经意间捡拾到了。

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把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基本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类，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格局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在社会的基本层面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这些人普遍年纪较轻，受教育水平不高，他们远离农村的故土，来到陌生的城市，从事的往往是诸如拾荒这样不被城市人看重，报酬低、风险大、条件恶劣且基本毫无稳定性可言但却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职业。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从着装、举止、话语、甚至肤色上不难辨认。这些被笔者称为灰色族群的人普遍具备乡村基因所赋予他们的善良朴实和吃苦耐劳的可贵品质，面对生活的重压和不被认同的现实，他们既没有怨声阵阵、怒吼连连，更没有眼红心嫉、仇视一切，相反，他们却能够从微不足道的小快乐中聊以自慰，寻求一种让人心酸的平静与淡然。《高兴》中多次描写刘高兴和他的拾破烂的朋友的“惬意”生活，比如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觉得今天赚够了；到小饭馆吃一碗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便是一种精神享受……他们用行动在城镇化的语境中解读着什么叫做利万物而不争，处低位而得道的水的本性。水逆众人是为了利众人，逆万物就是利万物，这便是至善之道。但在陌生而冷漠的城市里，他们拥善却无福，得道却无属。他们可以吃苦受累，但最难以接受的是自己属于尴尬的异类。他们是灰色的水，却不是浑浊的水，俨然便是城市脉络中的血液，看似不存在，却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流淌。他们最无奈且痛苦的就是无法定位自我，远离乡土的他们对于农村而言已经陌生，而他们所在的城市给与他们的往往又不是温暖和慰藉，更多的是无视和冷眼。他们身在城市，灵魂却游离在城市

和乡村之间，无着无落。他们处在了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难堪的灰色地带，不能自拔。

《高兴》的故事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城市展开，但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一部从灵魂深处凸显出农村精神脉络的乡土小说。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对于城镇化宏大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所遇到的最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所进行的深沉思考。小说传递出的核心理念恰正是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相呼应，让灰色族群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合理引导，合理布局的新型城镇化的阳光抹去他们心中的灰霾，抬头挺胸地将自己溶入城市生活之中。小说的结局里五富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躺在病床上口含鱼翅凄惨离世；刘高兴背着五富的遗体在火车站穿梭的人群中不知所措，读来让人扼腕唏嘘。刘高兴虽然对于城市充满了眷恋，但最后却仍旧努力想让自己的伙伴魂归故里，离开冷漠的城市。城市何时才不会成为让广大灰色族群流血流汗又流泪的所在，这便是作家在小说中发出的无声但却振聋发聩的叩问。作家最后还是让刘高兴留在了城市，似乎那里终将是他的归宿，留下就意味着希望还在，但结局是否高高兴兴，水到渠成，整个中国在拭目以待。如作家自己所言：“刘高兴曾认定（城里人）韦达的肾就是他卖的肾，但后来发现韦达换的是肝，他几度失落，这里有一种暗示：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刘高兴能不能在城里继续下去，我也无法说清楚，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吧……”^[5]。

三、《带灯》——萤火耀夜本为民

与《秦腔》相同的是，2013年的长篇小说《带灯》依旧接着地气，紧紧地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片叫做樱镇的土地上。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名叫带灯的女子成了故事的主角，这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尚属首次。作为樱镇综治办主任的带灯，让一个基层农村女干部的形象丰满张扬地呈现在小说中那个真实的民间，令人过目难忘。著名评论家潘凯雄曾这样评价：“《带灯》是贾平凹长

篇小说中惟一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贾氏过往的长篇小说中固然有现实的因素,但像《带灯》这样充满了如此现实关切的则惟此所独占”^[6]。既然是用充满关切的目光去细腻敏锐地关注现实,那么借用带灯这么一个从城市来到乡村的女性、一个心细如发且又工作生活在乡村的知性女性的眼光来记录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完美地实现了贾平凹对于细节描摹的要求和对于农村原生态本真面貌的记录。

带灯善于和乡村百姓打成一片,在全镇各个村落都有着自已可以信赖和信赖自己的“老伙计”,然而她在走访群众的过程中却始终坚持不在百姓家留宿,因为她害怕虱子。作为一个有原则有气魄的刚强女子,带灯却始终对小小的虱子避而远之,此间自然深蕴着耐人寻味的伏笔。在贾平凹笔下,樱镇的虱子品种繁多,体色各异,生命力和繁殖力极强,一旦被其沾身,用尽各种法子就再难摆脱。在弹丸之地的樱镇,小小的虱子恰正象征着民间积累已久且无法得到解决的各色纠纷、矛盾、冲突和仇怨,其深度和广度让人叹为观止。大到在身患尘肺病的农民工的维权诉讼,元薛两大家族就河滩采砂而爆发的利益冲突,再到各色救济款物的发放,低保资格的认定及对于长期上访人员的监督和控制,小到个别村民的鸡毛蒜皮、针头线脑的归属认定等等,都在带灯负责的综治办的工作范围之内。往往是过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有时新旧问题互相渗透叠加,又催生出了更为棘手的难题。这就好比不同种群的虱子交配后又产生新的变种,防不胜防,难怪会让带灯这样一个有灵气有心劲的基层干部也感到了极度的无奈。就像樱镇办公室主任白仁宝所说:“上天要我们能吃到羊,就给了膻味;世上让我们生虱子,各人都有了痒处”^[7]。皮虱沾身,如隔靴搔其痒,则充其量触及皮毛,寥寥数下,过后奇痒仍存;若褪靴用力搔之,痒感虽可暂去,但却容易挠破皮肉,过犹不及。小小皮虱,却道破了解决各色农村基层矛盾的艰辛和不易。如何把握好解决这些矛盾的最合理、最适度的力道,因其触及民生大事,实在是值得着力去思考和总结的大问题。它们一方面在最底层的

民间给予了中庸之道一番别样的注解;另一方面更是有力地考验着基层政府的能力和基层干部的智慧。

带灯而行的萤火虫的形象总体是美好的,给人以温暖,而与人肌肤相亲的皮虱形象却不大好,也往往易被忽视。这不光是因为它们身形渺小,更因为它们丑陋猥琐,嗜血如命,生命力极其顽强。它们看似来无影,去无踪,实则却是冤有头,债有主。在中国的基层民间,所有源于贫穷且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纠纷和矛盾都会成为滋生虱虫的温床。社会的肌体如被皮虱沾身,如不及时去除,便会聚虱成群,积小痒也就成终成巨痛。民间有了上访,那便是社会肌体某些部位的虱痒加剧了。樱镇的领导对付上访的办法是说服不行了威吓,威吓不行了打压。恰好比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把小小的虱痒放在心里,绕过不行就抠,抠过不行就抓,直到最后鲜血淋漓,两败俱伤。“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虱痒之害,丝毫不输于蚁穴火星。带灯从到樱镇伊始,就提议各村开展灭虱行动。但从上到下不但无人响应,还招来不少嘲谑和白眼。带灯恐惧并躲避着虱子,但最终还是躲不过被虱沾身的结局,这似乎象征了单靠一个小镇政府下设的综治办的一两个基层干部来解决所有陈年庞杂的民间纠纷和上访,是杯水车薪的徒劳之举。带灯只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即便竭尽全力,面对成群的皮虱,到头来自然是寡不敌众,最终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夜游的困境,不能自拔。到了小说的结尾,身为综治办主任的她也即将走上上访之路,恰好比萤火虫最终也加入到皮虱的行列中去,让人读来感慨不已。

《管子》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其知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在城镇化的乡土语境中重释管子的思想,便是农业发展与改革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也就是说,改善农民的生活,最大程度的保护农民的合法意愿和权益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村建

设，继而是城镇化建设都至关重要。城镇化的过程不是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而是富裕农民的过程。但必须承认，现代农业在中国的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仍会遇到种种问题和阻碍，两者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而且往往举步维艰，全面且深刻地考验着农村干部的能力与智慧。在《带灯》中，萤和虱两种小虫飞舞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在细致描摹乡村各色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同时，将一个身处基层，专门负责解决各类纠纷和矛盾，努力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乡村女干部的形象塑造得圆润丰满，进退有致。与夏天义的土命和刘高兴的水命不同，带灯是火命。萤火耀夜，如一星灿然的烟火，但却是短短一瞬，火光散去，继而又是漫漫长夜。贾平凹称全书扉页上的文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是概括《带灯》这本书、这个人、这一生最切实到位的语句。的确，此句生动贴切，且不乏弦外之音。如何才能让带灯们尽情发光而不再流泪，是值得作者、读者乃至整个社会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语境中去认真思考的。

四、结 语

中国的城镇化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紧密相连，互为依托。比之于养育华夏民族万年有余的农耕文化，现代都市文明之于中国大地还只是蹒跚学步。除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之外，从古至今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对此亦有着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记录。时至今日，随着大量的青年农民踏上了去往城市谋生寻梦的道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日趋衰落的事实已然无法回避，依附于其上的中国乡土文学亦正在面临着存与亡的抉择。所幸还有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当代乡土作家，依旧把笔端凝注于中国农村的高山丘陵和茅屋巷陌，用蘸满传统文化和求实精神的笔墨在为中国特色的乡土之道寻找文学理据，进而把一部部饱含泥土厚味的文学作品铺陈于世人眼前，在字里行间展示他们对于乡土的膜拜和乡情的眷恋。

浩瀚的中国城镇化蓝图上无论如何不能少了那一抹抹乡土的颜色，因为那才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如何让这浑朴厚拙的底色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永葆鲜亮，以行文质朴、关照现实、不避忧患、聚焦故土为特色贾平凹式乡土小说多少道出了问题的答案。《秦腔》从一个疯子引生的视角，见证了豪迈的秦腔的由盛转衰，象征了传统农耕文明虽已颓败，但其间所深蕴的中庸之道却依然浩荡蓬勃；《高兴》伴着两个拾荒者的喜怒哀乐，深入到城市的灰色地带，通过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真实生态的逼真刻画，重新定义了何为善之至者，进而希望引发整个社会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反思；《带灯》拂去经年累月的尘垢，将落后农村所堆积潜藏的各种民生问题摊开在阳光之下，试图唤醒施政者以民为本的管理智慧与忧患意识。三部作品以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为指，把脉中国社会和农村的现实生态，在字里行间所点出的有关中国农村的症候及症结都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也无法回避的。贾平凹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农村广袤大地的变迁与脉动，在一个个鸡零狗碎的生活常态中让文学与乡土之道，进而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唇齿相依。可谓是细微中见细致，大俗中蕴大雅，成功诠释了“文以载道”在当下的定义。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大地上必定会让贾平凹这样贴近地气的作家找到更多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拭目以待。

参 考 文 献

- [1] 陈晓明. 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J]. 当代作家评论,2006(3):4-17.
- [2] 王晶晶. 贾平凹: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J]. 环球人物,2013(3):206.
- [3] 贾平凹. 秦腔[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 [4] 罗小艳. 贾平凹:放弃写作,那还叫什么作协主席?[J]. 南都周刊·生活报道,2007(164):39-42.
- [5] 李萍. 贾氏作品中最瑰丽忧伤的创作[N]. 江西日报,2013-1-18(3).
- [6] 贾平凹. 带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6.

(下转第100页)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YANG Yuan, XIAO Guo-qing, XU De-long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Depend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experiment progra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actively propels and reform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the manner of a "three vertical and three lateral" curriculum with multi-base practice and open teaching. With a decade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ree professional emphas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 have been mutually complemented and supported, thus equipping a batch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profound foundation, wide professional range, strong ability,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talent training platform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the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e training, which is conducive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initiative of running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materials majors; training mode; management mode

【编辑 程广平 高婉炯】

=====

(上接第93页)

A Review on Jia Pingwa's Reflection on the Ways to Prosper Homeland in His Novels under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WEI Yan-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evitable tre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ne the significant marks of social progress, the urbaniz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is expected to keep a record of this great historical reform taking place in China. In Jia Pingwa's novels like *Qin Qiang Opera*, *Happiness* and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top priority is given to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supreme goodness and sovereignty of people with vivid and meaningful expression, hence a rustic effe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 three novels are Jia's writing context deeply rooted into the vast area of countryside and his spirit achievements when nurtur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also reflect Jia's literary persistence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Jia Pingwa; urbanization; rustic effect; the golden mean; supreme goodness; sovereignty of people

【编辑 王思齐】